



每年春节,小英子一家都会去逛厂甸庙会,到厂甸的第一件事,就是走进名号为“铸新”的照相馆拍照片。长大后,小英子成了大作家林海音。她在小说《菊》中,还安排主人公淑芸到铸新拍了一张肖像照。

铸新照相馆创立于何时,已经难以考证。不过,它的创始人郭葆昌倒是颇为传奇。郭葆昌(1867年-1942年)原籍河北定兴县,是名满京城的古瓷学家、鉴赏家、收藏家,一度担任袁世凯的“陶务总监督”。他早年在古玩店做学徒,出师后独当一面,攒下了名气和资本,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一件事是,赎回了溥仪抵押在日本银行的《中秋帖》和《伯远帖》,使这两件文物没有流入日本。令诸多友人不解的是,与众多古董商都有来往的郭葆昌,没有选择开设古玩店,而是在海王村公园门前左开了一家照相馆,这就是铸新。

在林海音记忆中,铸新是“一家不错的照相馆”,有着“小巧的门面,整洁的照相室,和气的照相师,高级的照相机”。这家照相馆似乎没有大红大紫过,但因它与书画界、古董界的独特往来,在众多文人的笔墨间留下了不少逸闻趣事。

与侧重于拍人像写真的照相馆不同,铸新以拍摄古玩静物照片而出名。它的橱窗里陈列着文玩字画,以及瓷、铜、陶器、碑帖等的照片,向来往行人展示着本店特色。《北京画报》曾介绍说:“该馆精于拍摄金石书画,以备收藏家及各报馆之需,故常与各报馆及名书画家有往来。”当年,铸新有20多张文物照片发表在《北京画报》上。把此类照片提供给媒体,或出售给古玩爱好者,成为铸新的一项稳定收入。

拍摄人像当然也是铸新的主营业务之一。除了老顾客林海音,文物专家王世襄、北大教授徐泓等,都曾在文章中提及亲友到铸新拍照的经历。林海音对铸新摄影师的回忆尤为生动:“我们和妈妈摆好姿势坐在照相机前面。于是照相师站在照相机旁,把那块红黑夹层的方形布蒙在他的头上,头伸在蒙布外面,举着带开关的绳索,郑重地命令下来:‘好了,不要动,头抬高一点儿,低一点儿看这儿!’咔嚓一声,我们全进了相片啦!好紧张!”

不过,总体来说,“该馆门面普通照人像生意,不甚发达”,单靠人物摄影,还不足以让铸新盈利。在照相馆之外,铸新还出售画册书籍。琉璃厂一带是书坊荟萃之地,铸新受此影响,并结合自身专长,编印发售名画图册、书法碑帖、瓷器辑录等。文物研究及鉴定专家朱家济就留下了少年时期从铸新购买《启法寺》《庙堂碑》与《孟法师碑》影印本的记录。

据1931年3月4日天津《益世报》报道,铸新照相馆已经易主,主事人变成“纯粹商人”。大约正因如此,铸新从此热衷于赠名人的热度,营业方式更加商业化。就在1931年,它曾把收藏家傅增湘、画家齐白石、陈半丁、邵逸轩的照片放大,悬挂在橱窗里,引人注目。其中动静闹得最大的,当数齐白石的裘扇照。

1930年年末,铸新摄影师为齐白石拍摄了一张裘扇照——身着狐裘,头戴黑帽,手拿折扇,扇子上写铭文曰:“摇扇可以消炎,着裘可以御凉。二者日日须防,任人窃笑颠狂。”这张照片与平日里齐白石的风格大异其趣,所以“逛厂甸者,莫不立于翁之像下,朗诵裘扇铭一遍。是亦铸新照像馆新创之宣传广告也”。不仅如此,当时多家报纸报道了此事,并刊发了齐白石平生最“拉风”的照片,一时之间,铸新名声大振。

1931年春,京津两地媒体刊文称,铸新“相传即清时革命党谋炸五大臣秘密机关之遗址”,为照相馆增加了不少传奇色彩。不过,没过多久,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的职员伊见思就发文“辟谣”:1905年吴樾谋炸五大臣时,铸新所在之处尚是厂甸空地,而1910年汪精卫谋炸摄政王载沣,秘密机关设于琉璃厂火神庙夹道守真照相馆。

1936年第10卷第6期《北晨画刊》还有一篇文章提到,慈禧太后扮观音菩萨的照片乃铸新摄影师进宫所拍。这种说法也是混淆视听,慈禧确有扮观音的照片,但并非铸新拍摄,而是裕勋龄拍的。

以上两条假消息,都发生在铸新易主以后,不知是时人捕风捉影,还是铸新有意炒作。无论如何,1937年北平沦陷后,铸新在报刊中、在古玩书画界人士的记录中,被提及的次数已经越来越少。新中国成立后,经历公私合营的铸新,最终汇入了人民摄影事业的大势中。

张永炳 文/图



10岁的林海音(左二)与弟弟妹妹们在铸新拍摄的合影。



铸新拍摄的齐白石裘扇照,堪称民国时期的成功广告案例。



墙上悬挂着多人肖像,左上大胡子人像疑似张大千。

铸新留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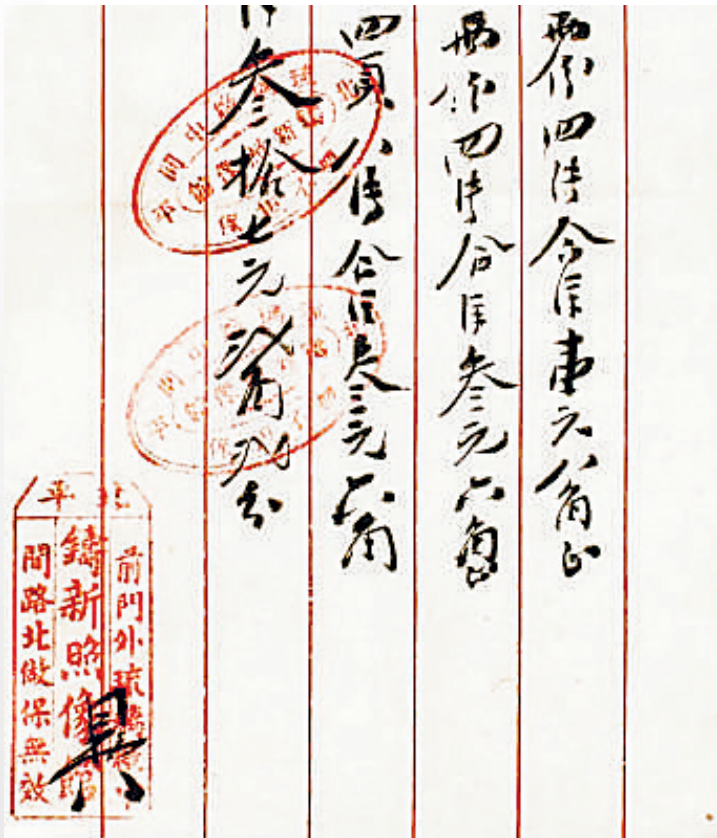
铸新照相馆影印的《孟法师碑》内页,红色字体为朱家济先生题跋。



1931年,厂甸小吃摊背后的铸新外墙上,挂着齐白石最“拉风”的照片。



厂甸庙会,摊位后面是铸新照相馆,拍摄于1924年至1927年。



古董摊背后,可以看到铸新的门面。

铸新出具给顾客的账单上,可见其公章。